

亚洲疫后经济复苏具有优势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下子打破了各国正常发展节奏,引起全球经济的急剧衰退和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日前在“亚洲和中国经济展望: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研讨会上说,在全球抗疫过程中亚洲是个亮点,能在疫情比较早的阶段进行很好地控制,虽然后来还有一些余波,但总体来说疫情规模和确诊率都维持较低水平。

朱民介绍说,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调动全国各地4万多名医护人员集结湖北,中国用一个多月时间将疫情控制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管控政策迅速到位,而且民众公共卫生意识比较强,对政策能够理解和配合。另一方面,亚洲多数国家在控制疫情的过程中采取了科技手段,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因为控制疫情较为迅速,亚洲经济受损伤的程度相对欧美等国家

较小,经济的反弹也比较快。”朱民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为4.9%,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衰退仅为0.8%,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在今年保持积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增长率为1.0%,在全球经济增速大幅度下降时稳住了增长趋势。

IMF亚太部主任李昌镛也认为,亚洲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表现好于《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较早地稳定下来。在疫情不出现第二轮暴发并且各国实施空前刺激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的情况下,预计亚洲经济增速在2021年将强劲反弹至6.6%。但是,即使经济活动快速回升,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产出损失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这是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更为疲弱,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防控措施将持续很长时间。部分亚洲国家的隔离政策从5月才开始,所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可能从二季度开始凸显,特别是在消费领域。”李昌镛说道,由于采取了保

持物理距离和减少病毒传播的措施,导致个人行为发生了变化。因此即使疫情结束后完全解除了封锁措施,经济活动也不太可能立即回到充分运转水平。IMF近期研究显示,封锁措施可能导致经济活动每月收缩约12%,防控措施完全取消仅能使经济活动增加7%左右。

李昌镛分析,亚洲严重依赖出口和全球供应链,在全球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亚洲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由于外部需求减弱,亚洲贸易预计将显著收缩,日本、印度和菲律宾的贸易总额今年预计将下降20%左右。亚洲增长模式从高度依赖出口转向倚重国内需求的调整过程已经开始,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展望未来,亚洲疫情结束后经济发展仍非常乐观,亚洲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互助、亚洲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坚持等都将推动本地区在疫情后经济能较好发展。”朱民认为,首先,亚洲拥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可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和技术,但这些国家都面临严

重老龄化,需要和外部合作。其次,中国是经济增长较快的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经过测算,2025年中国的商品消费市场等同於欧洲和美国的总和,大量的需求对经济可起到拉动作用。再次,东盟作为亚洲的一个重要板块,投资贸易都非常活跃;最后,印度等南亚中亚国家也不能忽视,南亚和中亚的18亿人口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并且和非洲南部一样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结构。“这四大板块在亚洲具有互补优势,在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下,不同资源的合作整合使得亚洲未来发展前景乐观。”

谈到产业链,朱民认为,由于技术的发展等因素,全球产业链正在塑造和重建中,通过对亚洲产业链因素分析发现,亚洲的经济关联度是最强的,因此亚洲在全球产业链重塑时拥有很好的机会,形成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区域更扩大、更包容的产业链,这对于亚洲的发展甚至对于全球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好处,亚洲疫情结束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会更加突出。

美国的家居服、意大利的秋装……在位于浙江省象山县爵溪街道的汉森针织厂里,流水线火力全开,工人们正忙着打包发往全球各地的“基础款”纺织产品。

“该来的订单没来,不该来的却来了。”汉森针织总经理周志康将2020年春节后的外贸市场定义为意想不到的“开局”——曾经不起眼甚至瞧不起的“跑量”单成为他在疫情下的“续命”单。

从精品服饰到普通服装,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周志康以低利润的更多订单换取工厂不停转,“10万件订单,毛利润只有5万元,我可以不赚钱,但工人们要赚钱。”

“很多企业选择出口转内销,但在我看来境外仍有较广市场。”周志康直言,随着疫情在境外的大流行,很多外贸企业不得不“放低姿态”,寻求国内渠道,但是仍有一批企业坚守在“出口”路上,不断拓宽境外市场的深度与厚度。

在周志康看来,诚然,目前外贸企业面临着转型危机,但转型非指代“跨界”,“在我看来,转型主要是指在本行业内进行自我提升。”

“如今的外贸市场并非没有订单,紧缺的是含金量较高的单子。”周志康以所在企业为例解释道,含金量较高的订单主要是指精品订单,技术含量高且利润也比较高,“例如国外一些文化体育赛事服、奢侈品服装市场,一票就可以有600万的销售额。”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工厂还没有收到海外的精品订单。”尽管高含金量订单的缺失令他失望,但进入调整期后,企业也收到一些家居服订单,让企业得以正常运转,“就是企业不赚钱,但也能保持活力,不会倒闭。”

事实上,周志康遇到的问题并非个案。记者了解到,他的工厂位于百里黄金海岸之滨中国针织名城——爵溪,在不到3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500多家中小微针织企业。

无疑,外贸针织产业是爵溪特色,以外向型经济为优势的多业并举共同发展格局,让其成为中国针织外贸出口生产基地之一。

回顾往昔,一批针织服装订单下来,只要短短几天时间,爵溪企业就能完成织布、染整、印花、服装加工、包装全过程。

审视当下,受海外疫情影响,大批针织企业外贸订单锐减,经营压力加大。疫情危机面前,中小外贸企业坚守亦或转型,亦或消失在行业领域,不少外贸人都在深思这个问题。

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处于调整阶段的富明针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叶敏仍保持着工厂的高效运转。

在富明针织的流水线上,工人们正在包装运往德国的订单。“自复工复产以来,我们的工人没有停过工,接的都是外贸单子。”周叶敏告诉记者,如今的内销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在抢内销市场,把价格压到底线。”

周叶敏的底气来源于其工厂不间断的海外订单,虽没有往年的高利润,但是工人工资却仍保持往年水准,甚至因为加班赶单子而高于往年。

谈及外贸订单稳固的秘籍,周叶敏坦言主要是凭借无法替代性,“国外也需要穿衣吃饭,生活必需品的订单是无法取消的,市场是一直存在的,而我们要做的便是在花色、工艺上进行深耕,增强竞争力。”

若说疫情带来的变化,周叶敏感触更多的是物流交通的延时,“船期变长了,没有此前便利。”

事实上,在外贸大省浙江,不仅仅是偏居一隅的针织产业,在块状经济的背景下,中小微外贸企业的生存之战早已打响。

纺织外贸企业抗疫稳出口记

■ 林波

连线自贸区

海南自贸港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首单落地

本报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来,着力改善外汇营商环境。据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近日介绍,该行已为企业办理自贸港首笔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业务。

促进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一项重要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近期发布《关于开展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工作的通知》,支持审慎合规的银行在为信用优良企业办理贸易收支时,实施更加便利的措施。

其试点内容包括,试点银行优化贸易外汇收支单证审核,简化进口报关核验,试点企业免于货物贸易特殊退汇业务登记手续。试点内容实现银行审核从事前向事后转变,从而进一步推动贸易结算便利化。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是该业务在海南自贸港内的首家试点银行,结合企业对于外汇收支便利化的具体需求,该行制定相关的银行风控措施,试点政策出台后,第一时间帮助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享受政策红利。

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生产烟用BOPP膜的企业,产品主要用于食品、药品的外包装,每年进出口业务所办理的贸易外汇收支额近千万美元。在“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中,该公司向银行申请收付款的过程十分钟即可完成。

据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介绍,近期将陆续为其他试点企业办理该项业务,发挥跨境金融专业优势,服务自贸港实体经济发展。 (王于谦 宁静)



日前,7000罐共3.5吨哈萨克斯坦骆驼奶粉运抵甘肃省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并在线上售卖。图为工作人员将骆驼奶粉推入仓库。 兰州新区商投集团供图

从追随到领先: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正好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设立经济特区在世界各地都被认为是重要的国家发展政策。日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分析了中国经济特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发展历程及对全球的影响和启示。

中国拥有数量最多、类型最多的经济特区。1980年,中国在东南沿海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将经济特区提高到新的水平,这些经济特区的规模远大于早期的经济特区,并设在现有城市或附近地区。《报告》回顾说,在过去的40年中,全球经济特区与中

国经济特区相伴并共同发展。中国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特区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以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到1990年代末,随着中国低成本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工业区)升级,其内陆和边境地区建立了更多的经济特区,并开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经济特区经验。

《报告》分析说,深圳是于1980年前后以低端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础建立的经济特区,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特征是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以应对不断上升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以及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将深

圳建设为高新技术制造、金融服务和物流中心。2003年,深圳加强了对文化产业的重视。2009年,深圳致力于发展为国际创新中心。深圳经验还推广至新疆的喀什和霍尔果斯等西部城市。几年前,深圳侧重于工业创新,为此采取了财政激励措施,以吸引国家、省级和市级的研发实验室以及跨国公司建立的实验室。国家和省级实验室,特别是那些获得“优秀”证书的实验室,将获得最高1000万元人民币(150万美元)的资助,而每个市级实验室将获得500万元人民币(75万美元)的资助。深圳还提供5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来抵消这些实验室的建设支出。此外,深圳还建立新的研发实验室空间,新技术公司可以在两年

内免费租用,并在接下来的三年内租金减半。这些新的激励措施促进了高科技和新兴技术公司的密集涌现和迅速发展,它们令深圳处于当今全球技术创新的最前沿。

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特区数量众多且类型多样,但未必都能像深圳特区这样成功。《报告》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如基础设施薄弱、官僚主义以及对土地征用的抵制,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特区做得不好。建立时间、治理结构以及各种决定性和促进因素,造成了经济特区成效的差异。对于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报告》还列举了两个重点:第一,政府协调各种类型和位置的经济特区实现多个目标的承诺,推动工业化、创造就业、促进出口,引导

技术转让和创新,促进更广泛的区域协同发展;第二,纵向和横向政策协调对于创建真正需要的经济特区,以实现明确和可实现的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报告》也关注了中国经济特区建设走向海外产生的新亮点,由一家区域性的中国民营公司根据国家间双边协议建立的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是范例之一。该经济合作区基于边境地区的综合城市,活动规模大、种类繁多,能够促进老挝北部地区的发展。中国与非洲共建经济特区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共建的制造业区不断增加,并在对内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出口等方面取得预期成果。

国际商情

哈开放中哈边境三个过货口岸

据腾格里新闻网报道,日前,哈萨克斯坦政府通过《关于临时关闭哈萨克斯坦部分边境地区公路口岸》第155号政府令修正案,决定有条件恢复开放上述三个公路口岸,允许运送医疗物资、药品、食品、投资合同项下商品、人道主义物资、政府采购物资的人员和车辆通行。哈外交部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通报情况。

奥推出10亿欧元外贸出口信贷担保

据《新闻报》报道,奥财政部与私营信贷保险机构达成一致,共同为企业提供10亿欧元的出口信贷担保,以化解奥出口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临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其中联邦政府将出资8.5亿欧元,私营信贷保险机构将出资1.5亿欧元,作为回报国家将获得45%的保费收入。担保期限暂时执行到年底。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中企国际化:应对挑战 积蓄新动能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企国际化,那就是中企用十几年时间走过欧美发达国家百年国际化之路。”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王钰在题为“新时代企业国际化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动能”讲座中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双元驱动的中企国际化特色道路,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品牌寻求型、标准寻求型和话语权寻求型是中企国际化的主要动机。

在王钰看来,中企国际化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1978年至1991年,是以“引进来”为主的国际化带入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开放国门,引进外资,激发国内市场经济活力。此时对外发展的行业相对单一,主要是服装、轻工业,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和场地等优势。”王钰回顾

说,当时的标志性成果是1980年4月成立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发展到今天,该公司拥有员工近3000名,日均配餐量超10万份,每日配餐航班超500架次。

“1992年至2001年,中企国际化则处在以大规模引资和产品出口为主的国际市场拓展阶段。中企不仅通过代工方式让产品‘走出去’,同时有目的、有规划地‘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结构开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民营企业开始走向国际舞台。”王钰说,这一阶段典型的国际化企业是华为,1996年该企业首先在香港开启国际化,第二步开拓俄罗斯市场,然后是东南亚和拉美市场,2001年开拓欧洲市场。至2005年,该公司海外合同销售额超过国内合同销售额。

王钰认为,从2002年至2013年,中企国际化走到第三阶段——“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进提速。“这一阶段要解决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培育中企国际竞争力,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在此期间,我国进一步放开外贸经营权,规范、引导和鼓励中企进行境外投资。特别是2008年以后,‘走出去’进程加速,实现跨越式发展。”王钰回顾说,这一阶段企业国际化的典型案例是2010年3月28日,吉利汽车与美国福特汽车正式达成协议,吉利收购沃尔沃,沃尔沃汽车此后十年时间全球销量翻一番,2019年销量首次突破70万辆,双方都获得良性发展。

“从2014年至今,是中企全球布局的高质量走出去阶段。这一阶段要解答如何健全企业国际化管理

制度和服务体系,提升中企全球影响力等问题。在此期间,中国跨国公司开始具有较大的全球影响力。”王钰观察到,福耀玻璃在美国的投资可以视为此阶段的典型案例,从中可以看到对美投资是在以国际化来应对逆全球化,对外投资正在尝试解决文化冲突和融合等问题。

中企国际化走到今天,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王钰分析说,这主要表现在: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形势;中企对外投资重数量、轻质量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数字经济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完善法规,保护隐私和数据安全,减少相关企业出海阻力;东道国投资审查要求不断提高,隐形壁垒也不鲜见。

不过王钰认为,包括已经在推

动的几项改革在内的多项努力有望缓解这些难题。“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全球治理新方案,自贸试验区(港)建设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新动能。”王钰还建议,要为中企国际化提供更多法律支撑,推动企业海外合规经营,其中一个重点是加强中国在国际组织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为企业合规出海提供更多国际规则层面的支持。

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改革创新,王钰在走访中还发现一些微观层面、很有帮助的创新尝试。“成都国际商贸城2018年获批为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我去调研后发现它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出口,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问题。所以像这类规模并不大的创新尝试也很实用。”王钰感慨道。